

# 统筹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思路与对策

黄建忠 王思语 王茜

**摘要：**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者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命题，也是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面推进“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基本工作要求。本文深入剖析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内涵、主体与时序关系及模式特征，系统阐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稳定性、成长性、开放性、包容性等层次化内涵要求，并结合 GATT/WTO 条款，提出了甄别安全类型，清晰把握经贸安全界限与反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性地阐述了新时代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三者关系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思路；对策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4) 4-0001-11

## 引言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 75 年，也是我国全面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在世界经济持续不稳定不确定的复杂背景下，深刻理解、全面把握、统筹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者的辩证关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命题，也是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全面推进“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基本工作要求。本文深入剖析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内涵、主体与时序关系及模式特征，系统阐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层次化内涵要求，并提出甄别安全类型，清晰把握经贸安全界限与反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性地阐述了新时代统筹处理好高

[收稿日期] 2024-02-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研究”（22ZZD062）

[作者信息] 黄建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思语（通讯作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副教授，电子信箱 mayjay435@163.com；王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副教授

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三者关系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 一、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内涵、主体与时序关系及模式特征

### （一）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内涵与目标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创新核心要义是围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开展的制度型开放，其长远目标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而中短期目标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金观平，2023）<sup>[1]</sup>。具体而言，在当前阶段，高水平开放的目标在于实现产业链自主可靠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及增强内循环的内生动力与提高外循环的质量水平。

### （二）高水平开放的主体与时序

对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构成的制度型开放，可以从开放主体的关系和开放时序的关系，即从“对标”和“对表”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和把握：

第一，从开放的主体关系分析。规则（Rule）是世界范围内多边、区域、双边乃至单边对外形成的稳定的经贸关系行为准则，它通常包括国际条约、政府间协定和一国正式对外公布的、具有强制约束性的经济关系法则。它具有中性非歧视、透明性和监管一致性等显性特征。为平衡各方利益，在通常情况下此类规则附带有某些特殊的“例外条款”“保障措施”和“过渡期安排”。规制（Regulation）是一国政府（含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政府部门）依据其法律地位制订的与国际规则相互衔接、相互适应或由国际规则转化而成的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制度，可视作一国对外开展合作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承诺。管理（Administration）是一国政府及其权力机构、行政部门依据规则、规制与国内市场企业主体之间发生交互关系的行为方式或行政监管模式。标准（Standard）是微观市场主体在上述规则、规制、管理要求下，提供产品或服务所应达到的水平和质量要求。它包括一国参与缔结的国际组织机构的标准，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框架下具体领域的标准要求，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商标权、专利权保护要求，以及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常涉及的区域伙伴、对方国家（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标准要求，例如通常所说的“欧标”“美标”等。一国自身的产品和服务标准要求，即通常所称的“国标”，也应在开放对接中充分反映上述各类标准的趋势要求。由此可见，国际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之间具有法律和行为主体层层相扣、递进衔接的逻辑关系。我国的制度型开放创新必须在上述四大核心内涵上开展系统深入的“对标”改革。

第二，从开放的时序关系分析。在静态意义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是一国已经参与缔结的多边、区域组织条约和双边协定既有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是在条约或协议项下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所应遵循的全部行为准则。就中国而言，它包括了世贸组织（WTO）、《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气候合作《巴黎协定》，以及中国参与缔结的其他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组织、协定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在动态意义

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包括了一国拟参与缔结的多边、区域组织条约和双边协定既有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以及在此类条约或协议项下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所应遵循的全部行为准则。就中国来说,它包括中国正在积极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及中国谋求推动实施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等形成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拟承诺接受的具体条款要求(王晓红,2022)<sup>[2]</sup>。在趋势意义上,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还泛指那些中国未曾参与缔结,而事实上可能影响中国已参与、拟参与、甚至将来可能发起缔结的多边、区域组织条约和双边协定未来趋势走向的高标准自贸协定的法律框架、基本原则与具体条款要求。此类条约或协议的已有范例包括《美墨加协定》(USMCA)、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随着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积极参与引领国际经贸新规则历史进程的不断加快推进,此类协定框架下的大部分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理应纳入我国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求和规划议程范围。因此,我国制度型开放创新也必须完成从静态到动态的转换,进而实现适应趋势要求的“对表”开放。

### (三) 高水平开放的基础模式与特征

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基础模式是制度型开放(涂永红,2023)<sup>[3]</sup>。制度型开放是以边境后措施为主的制度交互和融合式开放。高水平开放的特征是制度型开放的不断深化。既要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实施主动开放,也要全面提升区域开放水平,优化开放格局环境。制度型开放意味着我国迈入改革开放新阶段,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能力的全面提升,其战略实质显然更加具备积极进取、开放动态、相互联系、交互融合的性质。

## 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多层次要求与动力模式转换

### (一)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文件反复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主题。究其根本,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固有的基本规律,即按照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根本矛盾的要求,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推进具备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秉承“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成果,其基础目标是“十四五”期间构建形成新发展格局,远景目标则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这是外部环境和基本国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逻辑结论。在现阶段甚至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外部环境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而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不景气、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增强、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政

治冲突、国际经贸规则高频度创新演化、亚太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等不可避免地对我国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国内经济在多重下行压力的作用下，各种固有积累的和新出现的问题矛盾日益显现。综合来看，此类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在根本上依赖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成长性克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自身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对冲大国博弈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复杂性，以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可持续贡献，以及以高质量发展化解国内经济社会新旧问题和矛盾，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 （二）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性要求

第一，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性要求。在通常意义上，发展的稳定性有赖于外部环境的稳定、透明、可预期性以及内部的良好经济基础和科学战略（冯其予，2023）<sup>[4]</sup>。凭借21世纪前10年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提供的战略机遇，以及国内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改革开放总体战略，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总量性、高速型、稳态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干扰冲击，逆全球化思潮盛行，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甚嚣尘上，外部环境出现了严峻复杂的变化，国内经济新旧矛盾显现。在此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尤其要注重充分发挥内部经济的四重韧性作用：其一，我国作为货物、服务进出口贸易大国的地位十分稳固；其二，我国作为外商投资吸引国、对外双向投资大国的地位难以撼动；其三，我国实体经济规模扩大和新经济迅速成长的动力十分强劲；其四，我国国有企业对市场引领能力与民企外资互动能力充满活力。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成长性要求。“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最新综合要求，体现了新时代经济工作“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指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反复要求发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强调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商务部在2022年9月14日召开的全国外贸电话电视会议上，提出“扩增量、防减量、强保障”的工作要求，积极鼓励和支持新经济、新业态、新平台、新渠道和新模式在对外经贸领域的发展，这是对商务高质量发展作出的科学部署。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以下三点：

其一，国民经济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稳中求进”。从国民经济“三驾马车”的地位作用来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缺一不可，应当做到“马力全开”，而不应简单地扬此抑彼。因此，“六稳六保”是一个整体性要求。对于现阶段而言，稳外资稳外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民经济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的协调共进，在同向增强的过程中追求国内消费能力和贡献的逐步增进。

其二，国民经济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以进促稳”。在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余势未消、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长期持续形势下，要化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一定的体量规模、增

量增速为保障，同时也不应满足于单纯高于世界经济平均水平的体量规模和增量增速。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乃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其三，国民经济全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先立后破”。本文认为，“先立后破”的核心在于“两立两破”：（1）一立良性预期，树立中国经济长期和基本面向好的信心。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不稳定、不确定的整体局面下应看到中国经济的成长与增长，在中国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形势下加快产业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引导国际国内社会形成稳定良性总预期的关键。（2）二立增量主体，从实践经验观察，近年来我国外贸稳定基本上依靠存量外贸主体，而外贸增长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量主体。事实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高技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新增企业持续增多，外商投资和民营主体的进入形成大量新经济、新业态、新平台、新渠道和新模式，对宏观经济稳定向好与打破外部遏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晓旭和李钢，2023）<sup>[5]</sup>。（3）一破保守被动，“六稳六保”政策的消极指向在于“以保求稳”。事实上，经济周期的实质意义在于优胜劣汰和资源重新优化配置，单纯保主体、保就业的政策不仅成本巨大，也往往达不到所求的成效。（4）二破本位主义，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阻碍我国外贸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区域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货源竞争、竞相压价、渠道扭曲、“互挖墙角”等现象危害甚大，因而尤需加大治理力度。

第三，高质量发展的开放性要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开放的驱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制度型开放“增油量”，借助结构性改革“清路障”。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全面推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交互融合，实现开放“加速度”。我国要坚定全球化多边主义立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但也要认识到WTO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充分认识到全球范围内区域、双边经济贸易协定已经进入高频率、高密度的创新演化期。方兴未艾的区域、双边经贸合作向着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标准的便利化自由化方向迅速发展，新型协定条款内容覆盖的范围与我国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重合性日益提升，无疑提高了我国围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进行“对标”开放的标准要求与“对表”开放的紧迫性。二是通过增强与亚太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来提高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粘性”，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自身产业链的自主可靠与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在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中促进国际分工地位的持续攀升。三是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开辟开放“快车道”。立足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导向，借助改革开放长期积累的试点经验，在投资、贸易、金融和创新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产业政策、国企中立、劳工权益、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压力测试”，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先分块后集成地累积结构性改革“加速度”，是开放性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第四，高质量发展的包容性要求。从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需要出发，我国高质量发展应当具备三重包容性：（1）发展的内部包容性。以人

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特征标准，衡量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2) 发展的外部包容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和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和加强多边主义合作，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贸合作，创造和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参与引领全球治理及其改革，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3) 发展的综合包容性。在内外发展合作中，坚持有差别的共同责任，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开放有先后、发展有快慢，先富带后富、民生兜底线，通过逐步缩小差距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 （三）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与模式变迁

高质量发展的深刻意义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即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转向科技创新驱动，实现对全要素生产率全方位提升，进而引致经济发展模式的连续变迁。以当前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例，一方面，数字生产要素及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产生的创新活力，赋予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性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储存、大数据、边缘计算、通讯技术等新技术要素的多元组合与综合赋能，成为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比较优势源泉；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创新催生了一系列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形态、区域结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会治理关系。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与模式变迁，实际上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黄建忠等，2022）<sup>[6]</sup>。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是新旧发展模式转换的引领力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新旧发展模式转换的基础载体。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集贸易大国、制造大国、服务大国、互联网大国、农业大国和数字大国于一身，融实体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活力于一体，具备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赋能、交互促进和融合发展的深厚基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1.5%。在服务业中，数字经济的渗透率更是高达80%以上（中国信通院，2023）<sup>[7]</sup>。总体上看，我国规模庞大、结构完整的实体经济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数字产业化快于产业数字化、服务数字化快于制造数字化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显著特色。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度融合发展的双向平台形成了新旧发展模式转换的基础载体。

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下，扩大内需是决定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与模式变迁成效的另一长期性、关键性、自主性变量。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国家经验（例如：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在1971年曾占美国总人口的61%，其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为20%~40%）来看，以对扩大内需的贡献力衡量，工资要素投入不足以满足扩大内需所对应的劳动者发展、享受需求，唯有财产性收入才能带来较大的价格需求弹性，进而引致劳动者满足发展、享受需求带来消费，达到扩大内需的效果。因此，我国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鼓励实现多种分配方式,为扩大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与模式变迁涵养深厚的社会基础。

### 三、高水平安全的类型、范围界定与运用把握

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关系时,科学辨识高水平安全的类型和范围,在国际间寻求相对统一、透明的概念界定共识,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辩证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三者关系,是实现高水平安全的关键。

#### (一)“安全例外”概念的基本涵义

安全概念本身具有狭义、广义之分。从追本溯源角度出发,狭义的安全一词源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文本中的第21条“例外条款”,WTO在后续形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第2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73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2条第2款及《政府采购协议》(2012年)第3条中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则安排。究其根本,GATT和WTO文本中的“安全例外”指处于贸易严重失衡或遭受极端损害关系的GATT成员双方,受损一方有权对另一方采取市场准入中“国民待遇”的例外措施或享有关税减让时“最惠国待遇”义务的豁免。其安全概念属于一般性贸易安全范畴。从广义角度理解,“安全例外”也可以延伸到贸易关系引致的“道德安全例外”“国际收支例外”等领域。但从最初定义出发,无论狭义或广义,安全的概念都仅限于GATT文本界定的贸易范围和类型,并且从历史经验上看,“安全例外”条款也几乎从未被成员方事实动用。

但是GATT和WTO关于“安全例外”的相关条款并未明确判定“安全例外”的主体权限范围、具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安全例外”的自裁性在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被随意使用和恶意泛化的事实倾向。

#### (二)国家安全概念的初始与泛化

与贸易领域的一般性安全概念不同,国家安全概念的使用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牵头成立、由17个国家组成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其宗旨是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1994年巴统解体后,它所制定的禁运物品列表被《瓦森那协定》(Wassenaar Arrangement)继承、扩大并延续至今。

发达国家在国家安全概念泛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该情形愈演愈烈。伴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弱化和区域、双边自贸协定的兴起,国际贸易、投资和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国家安全和一般安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核安全与恐怖主义、经济与环境、能源与气候、科技与网络、生物与卫生防疫安全等大量非传统安全概念逐步进入国家安全的范畴(Prazeres等,2020)<sup>[8]</sup>。在国际经贸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威胁到重要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实施出口管制、技术脱钩,限制贸易和投资、实施“长臂管辖”甚至经济制裁的情况不胜枚举。以国际投资领域为例,美国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审查的交易范围和管辖权,几乎

覆盖了所有与外国投资者进行的交易；《加拿大投资法》规定，政府拥有审查任何外国对加拿大企业投资的自由裁量权；英国将应对外国政府敌对活动和高科技发展带来的安全挑战引入2022年1月生效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德国出台的《印太外交政策指导方针》夸大德国在价值链上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并将保障国家安全和模糊的人权标准引入2021年《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法》等。

随着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被卷入国家安全泛化的浪潮。国家安全泛化具有“传染性”，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摩擦，使得各国陷入安全悖论和安全焦虑，各国在批评他国过度安全措施的同时竞相加码安全措施。

### （三）我国国家安全的定义范围和运用把握

全球范围内，不仅存在军事威胁，还存在非军事威胁。威胁不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敌国，还来自非传统的力量，如恐怖组织、毒品集团、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自然灾害和严重损害环境的行为也被视作非传统威胁的来源。因此，广义上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全面安全观，其外延比21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定义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更大，主要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使用武力、结盟外交、经济制裁和胁迫外交等（林桂军和Prazeres, 2021）<sup>[9]</sup>。

2015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定义，即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该项法律还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和深海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实行贸易政策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我国有关贸易安全的法规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2020年），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时，严格遵循WTO的基本原则（张晓晶等，2023）<sup>[10]</sup>。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战略出发，全力打造高水平安全，正确认识并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准确认清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础上，国际上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新议题谈判并贡献中国方案，国内以新质生产为发展目标完善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发挥产业比较优势、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 （四）积极寻求安全领域的国际共识与运用边界

鉴于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性，国际间应加强沟通合作，寻求安全领域的国际共识与运用边界，尽快形成涉及安全的贸易和投资措施操作规范，重点强调以下原则：（1）将国家安全措施作为贸易和投资所涉及措施的最后选项。（2）坚持非歧视原



则，对所有国家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和措施。(3) 保持法律 and 政策的透明，坚持公正和可预测的原则。(4) 坚持比例原则和对等原则，采取的措施一般不超过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要的限度。聚焦于解决重要问题，不随意扩大措施的适用范围。(5) 在实践中采取对发展中国家友好有利的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和多边场合参与合作的机会及有利的条件。

#### 四、辩证处理好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三者关系

##### (一) 高水平开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内循环需要依托开放推动发展安全稳定，外循环要求依靠开放提高质量水平，双循环协同发展才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和保障国民经济提质增效。通过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可为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充分赋能；通过高水平开放，构筑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新高地，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可为实现创新驱动充分赋能；通过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外贸外资在稳就业、稳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可为增进民生福祉充分赋能；通过高水平开放，促进绿色投资和绿色贸易，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更好地接轨国际环保标准，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可为保护绿色生态充分赋能；通过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治理，提升资源多元化获取能力，在能源、大宗商品和原材料、金融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降低外部波动风险；通过高水平开放，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全球技术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降低技术封锁和制裁的风险，可为安全保障充分赋能。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水平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和新动力。

##### (二) 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也是在大国竞合背景下赢得主动权的必然要求，其具体内涵包括统筹经济增长、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和安全保障五类目标。

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关系。安全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安全的保障。离开安全谈开放或离开开放谈安全，都不可持续。从国际视角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闭关锁国”绝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在当今世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相互影响。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的含义主要指军事安全，而高水平安全的基本含义则是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利用国内外科技和要素资源，以国民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在促进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同时确立和巩固有利的国际分工

地位, 稳定提升产业动态比较优势, 形成坚实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和节点, 并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位攀升, 维护自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并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 提升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综合影响力。由此可见, 高水平开放是集聚全球优势资源和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和路径, 集聚全球优势资源和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关键优势基础, 而高水平安全又为高水平开放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 (三) 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的基础

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力是高水平安全的外在表现, 它使本国人民、财产和政治体制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 最终目的则是维护国家自主发展的权力。与此同时, 唯有高水平安全能保障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稳定实施, 保证宏观经济政策顺畅达成目标效果, 保证企业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市场的稳定繁荣, 为居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 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高水平安全为高水平开放创造了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制、清明的政治和优良的治安环境是一流营商环境的关键基础, 是开放经济中发展对外贸易和扩大利用外资的必备前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经济, 促进全球经济相互依赖, 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集体性安全。现阶段, 我国必须坚持以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制度创新为突破口, 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发展。在加大“压力测试”中提升国家经贸治理能力, 完善经贸安全体系, 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水平开放的动态平衡和相互协调。

总而言之,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犹如行稳致远的“车辆”, 高水平开放恰似动力澎湃的“油门”, 高水平安全有如灵动自如的“刹车”, 唯有统筹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才能保障大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金观平. 以更大作为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N]. 经济日报, 2023-12-29 (001).
- [2] 王晓红. 加入 CPTPP: 战略意义、现实差距与政策建议 [J]. 开放导报, 2022 (1): 7-21.
- [3] 涂永红.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N]. 大众日报, 2023-06-05 (007).
- [4] 冯其予. 高水平开放持续推进 [N]. 经济日报, 2023-12-09 (001).
- [5] 王晓旭, 李钢. 上海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对策研究 [J]. 科学发展, 2023 (6): 42-47.
- [6] 黄建忠, 张体俊, 任航. 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 [J]. 开放导报, 2022 (4): 96-100.
- [7] 中国信通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3) [R/OL]. (2023-04-27) [2024-02-01]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 [8] Tatiana Prazeres, 林桂军, 任靓. 美国对华遏制和贸易秩序再平衡: 对 2019 年 WTO 的回顾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6): 1-18.
- [9] 林桂军, Tatiana Prazeres. 国家安全问题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改革方向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1): 1-15.
- [10] 张晓晶, 曲永义, 林桂军, 等. 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选择 [J]. 国际经济评论, 2023 (4): 9-43.

## Strategi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ordinating High-standard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HUANG Jianzhong WANG Siyu WANG Qian

**Abstract:** Coordinat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high-standard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is the basic proposition of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These topics are crucial demands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time seque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s of high-standard opening-up,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core objectiv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hierarchical connotation requirements of stability, growth,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mbined with GATT/WTO provision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distinguishing security types, clearly grasp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nomic and trade security and opposing the abuse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To sum up, this study expounds strategi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igh-standard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High-standard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level Security; Strategies; 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 张晨烨)